

文章编号: 1007-0346(2000)03-0019-04

转型期间我国居民的储蓄增长

THE SAVINGS DEPOSIT GROWTH OF CHINESE RESIDENTS DURING THE TRANSITIONAL PERIOD

郑志宏

7次降息之后,物价继续下跌,储蓄照常增长,表明人们对资金价格的变化已不再敏感。作者认为,目前出现通货紧缩并非偶然,而是由诸多长期因素累积而成。从需求方面来看,制度变迁过程中不确定性的增加促使居民调低预期收入,而调高预期支出,从而流动性偏好增强;而贫富差距、城乡差距的不断扩大更加剧了有效需求不足,间接导致储蓄增加。从供给方面考察,当前存在两大问题:一是市场上存在大量无效供给,需求无法完全满足;二是国有企业的严重亏损局面还未得到根本扭转,从而投资萎缩,经济不景气状况难以改变。因此,储蓄的异常增长是人们在经济转型期间为追求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而进行合理安排的结果。

从1996年5月1日至今,中国人民银行已经连续7次降低金融机构存贷款利率。其中,1年期定期存款利率从10.98%调到2.25%,减息幅度达79.51%。去年11月1日又对储蓄存款开征20%的利息税。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搭配操作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希望通过宏观调控,刺激消费与投资,扭转通货紧缩的局面,带动经济回升。然而从统计数字来看,城乡居民储蓄却从1996年底的38520.8亿元增加到1999年10月底的59270亿元,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自1997年10月以来已连续下降20几个月。面对消费持续不振、储蓄不断增长的局面,各方均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但主要还是集中在表层的刺激消费上。笔者认为,目前中国居民储蓄的异常增加不能片面地加以考察,而必须结合历史和制度的各个因素,从深层发掘现象的本源。因此,以下几点应格外加以注意并进一步研究。

一、制度变迁过程中出现的收入暂时减少以及不确定性的增加促使预期收入水平下降,从而流动性偏好增强

1、收入对于消费进而对储蓄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凯恩斯(Keynes)的绝对收入假定认为,消费支出与现期收入呈正相关关系,且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亦即边际储蓄倾向递增。弗里德曼(Friedman)的持久收入假定则认为,收入由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构成,暂时收入由于经常变动,主要由于储蓄;持久收入等于各个年龄段的平均收入,它依赖于当前的与未来的预期收入;决定消费的是持久收入。而根据霍尔(Hoare)的理性预期的消费函数理论,人们是依据对未来收入的理性预期来作出现期消费的决策。人们在形成这种预期时,可以利用所有可以得到的

信息,因此这种预期是合乎理性的。消费是对未来作出的预期收入的函数。

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竞争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加剧,城镇居民的收入增长受到极大的抑制。现代企业制度的改革加速了企业破产、停产和职工下岗分流的过程。现存的国有企业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实现资产重组,正不断地剥离出相对过剩的人员;而新的大量的就业人口又不断产生并加入竞争,这就改变了居民的收入—消费流量,即居民的收入因失业而减少,消费需求水平下降;而资本的产出能力不变,因而相对过剩。同时,劳动力供给过剩的显性化和市场化,也制约了就业工人工资的增加,甚至调节其下降。就业工人对是否失业预期不明,收入的未来生活保险性储蓄倾向强化。这类似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保罗·克鲁德曼(Paul Krucdman)描述的“日本综合症”,即:由于价格水平下跌,公司开始“合理化”,即大量解雇剩余工人;人们担心失业,消费更加谨慎;各类支出下降导致更多的失业,经济不景气导致物价不断下跌,加重了公司的债务负担,使现金成为更具吸引力的资产。在农村,农业由于受农业生产本身特点和农业内在规律的制约,对自然环境的依赖性很大,收入具有很大的不稳定性。而且我国在转型时期由于制度不完善,农民不仅承担了过多的社会义务,还承担了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义务教育、医疗卫生服务等投资和费用,而且由于政府的过度干预,农户难以根据市场需求作出理性选择,市场风险增大,从而直接限制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加。加之农产品市场疲软,价格下跌,乡镇企业效益下滑,农民去外地打工的劳务收入大幅减少以及自然灾害频繁等,近几

年农民收入增长率不断趋缓(见图1)。居民收入增长的缓慢必然导致私人消费的趋缓,同时,这一状况也造成对未来的较差预期,从而增加现时储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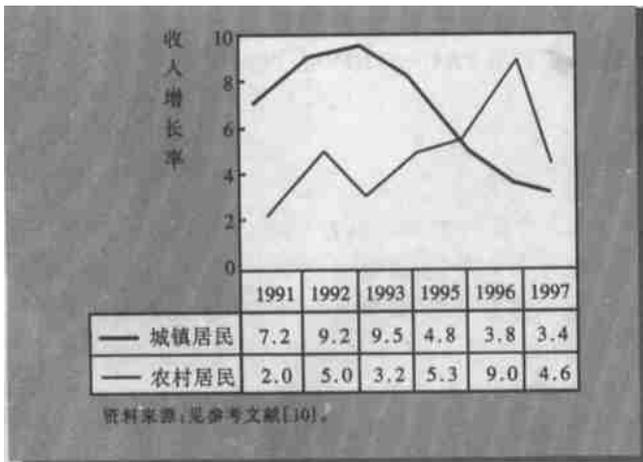


图1

2. 随着改革的逐步推进,实物分配的比例不断下降,货币收入在居民收入中的比重则稳步上升。由于货币储蓄比实物保管成本更低,损耗更少,且流动性更强,因此在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人们更倾向于储蓄货币以保持其流通手段职能,而不会将现有收入全部用于即期消费。如今在我国市场已越来越取得支配性的地位,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也开始越来越多地影响人们的心理预期。(1)制度变迁使人们未来的收入和支出更不确定,强烈的改革风险预期迫使人们着眼于整个生命周期决定收入安排。中国居民受儒家文化的影响,长期处于超稳定的小农经济结构中,自身就有抑制当前消费、为将来储蓄的传统,在当代急剧的变革过程中,养老制度、医疗制度、住房制度、教育制度的改革更加强化了公众的谨慎动机。预期收入的减少和预期支出的增加迫使人们将更多的收入份额用于储蓄。一份居民存款动机调查报告显示,居民存款的主要目的是:保证资金安全(31%),获取利息(20.3%),为子女作准备(18%),购买住房(13.5%),养老(10%),准备结婚(7.2%)。其中不难看出不确定性对于居民的深刻影响。(2)商品市场上价格因素的作用。自1994年以来,物价涨幅持续回落,1997年降至0.8%,1998年更降至-2.6%。去年一季度商品零售价格比上年同期下降2.9%,居民消费价格则下降1.4%。物价的持续下跌,使人们产生继续下跌的预期,加之买贵不买贱的心理作用,储蓄不断增加。(3)金融市场的不发达和投资收益的不确定制约了人们的投资决策。首先,作为市场体系三大支柱之一的金融市场在我国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很不完善。由于金融产品缺乏,信息不充分,信号不准确,人们难以获得预期收益。其次,证券市场低迷,股价

变动无常,缺乏理性,企业发行债券又受到严格限制,没有其他金融工具融通社会资金,居民无法进行资产选择,所以对利率调节并不敏感。再次,一般居民缺乏金融意识和投资经验,面对风云变幻的金融市场感到无从下手,力不从心,因而转向选择变现快、成本低、无风险的银行储蓄。

二、贫富差距扩大及城乡二元结构产生的消费断层抑制了消费需求的正常增长,间接导致了居民储蓄的增加

1. 已有的研究资料表明,低收入者消费倾向较高,储蓄倾向较低;高收入者则正好相反。而随着市场竞争的强化,收入分配愈益向高收入者倾斜,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从抽样调查结果看,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在全部城镇居民生活费收入中的份额分别由1991年的14.41%、12.11%提高到1997年的16.95%和13.33%,而最低收入户、低收入户所占比重则由6.69%、7.86%下降到5.32%和6.74%。就金融资产而言,1997年全国户均2.23万元,但是其中8.7%的居民占据60%以上的份额,而拥有20万以上的1.3%的家庭,就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31.5%。相反,43.7%的家庭却只拥有全部的3%。由于高收入家庭需求大多已经满足,或因适合他们消费的产品不足等原因,其平均消费倾向大大低于低收入家庭。1997年最高收入户、高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仅为71.36%和76.53%,比最低收入户的平均消费倾向分别低24.64和19.47个百分点。当年城镇居民的新增储蓄中,20%的高收入家庭占到42.27%,而20%的低收入家庭仅占4.76%。1995年全国居民的个人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已高达0.445,比1988年的基尼系数高出7个百分点,年均上升1个百分点。由于高收入家庭在全部收入中所占比重较大,而平均消费倾向低,因而带动全国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下降,由1985年的91.08下降到1997年的81.11%。与此相反的是平均储蓄倾向的提高。

2. 我国收入差距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现存的典型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为配合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赶超战略,人为地压低了劳动力、原料、能源、交通以及资金和外汇的价格;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限制劳动力的自由流动;采取反对非农业化的产业政策,将农业劳动力的机会成本降至几乎为零,从而由农民承担起资本原始积累的任务。据估计,从1955~1978年,工农业剪刀差超过6000亿元,农村为工业化付出了巨大代价,由此形成了经济待遇、社会地位差异极大的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由于农村资金被抽走,劳动力被阻滞,农村面貌难以改变,直接导致了农村居民与城市居民消费的巨大断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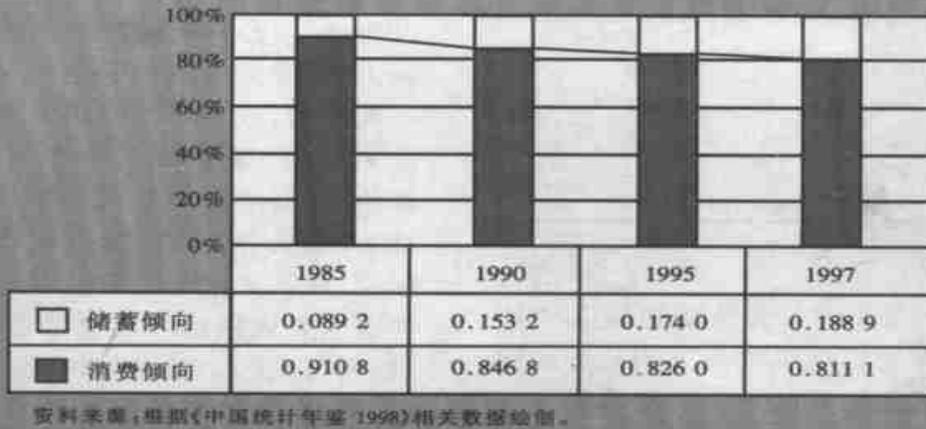


图2 城镇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储蓄倾向的变化

从时间上看，这一断层至少有 10 年以上的差距，而且这一差距有不断扩大的趋势。据统计，1993~1997 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平均增长 6%，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平均增长 5.4%；1998 年预计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 5 454 元和 2 150 元，实际分别增长 6.6% 和 4%，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之比由 1992 年的 2.33 : 1 上升到 1998 年的 2.54 : 1。

(1) 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农村购买力滞后。消费品零售额中，1986 年城市、县、县以下销售额的相对比例为 2 : 0.6 : 1，1997 年为 2.45 : 0.5 : 1。如果城乡经济同步发展，维持 1986 年的城乡消费级差，仅 1997 年农村消费水平就减少了 5 397 亿元，加上县一级减少了 9 603 亿元，相当于 1997 年 GDP 的 12.5%，相当于第二产业产值的 26%，按人均产值 20 000 元计算，等于减少了 4 300 万个工作岗位。具体的城乡之间的差异可参看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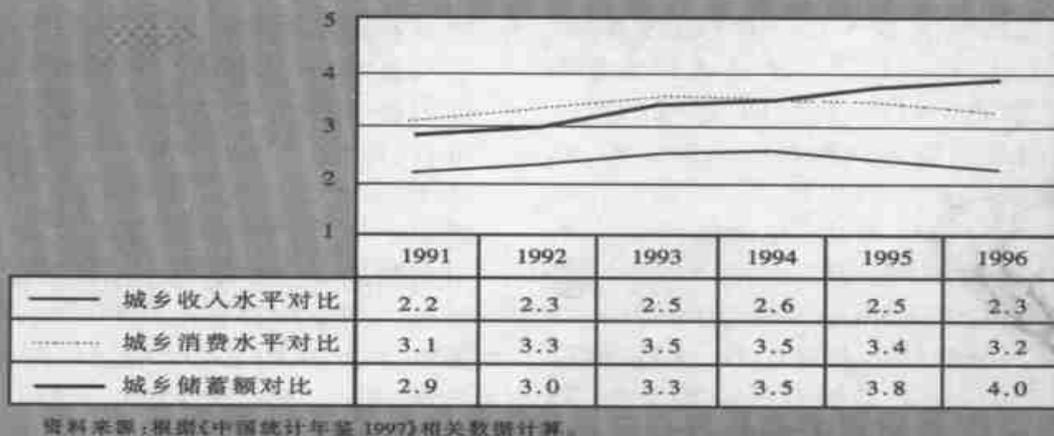


图3 城乡居民收入、消费水平与储蓄额比较(均以农村居民为1)

(2) 我国城乡居民家用电器的普及率存在很大差异，城镇居民持有的家电数量远远多于农村居民。即使是同一收入层次的城乡居民，农村的家电普及率依然显著低于城镇；甚至经济最发达地区农户的家电普及率，也明显低于城市最低收入户的家电普及率。目前农村家电拥有率仅相当于 1986 年城市的水平。城乡居民家庭家电普

及率对比见表 1：

(3) 在消费结构上，农村居民食品消费占其总消费的比重明显高于城镇居民。1995 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仍高达 58.6%，而城镇居民在 1984 年这一系数就已低于 58%。对城镇居民来说，食品、服装、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已经饱和，但在消费需求升级过程中出现了空挡，表现

表 1 1997 年底城乡居民家庭每百户家用电器拥有量

	城镇居民	农村居民
电冰箱	72.98	8.49
彩电	100.48	27.32
洗衣机	89.12	21.87
收音机	57.20	32.02
电风扇	165.74	105.93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1998》。

在住房和小汽车由于价格过高,城市居民现期购买力不足,尚需时间储蓄、积累。而农村居民则由于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渠道不畅,收入增加缓慢,其低水平的需求无法吸纳城镇居民消费升级后过剩的工业品,仍然体现为一种无购买力的需求,因而也转为储蓄。

三、大量无效供给的存在,直接限制了消费的增长

马歇尔(Marshall)认为,在萧条时期,消费的瓦解的确是促成信用和生产继续瓦解的原因,但救治的方法并不是来自对组织生产和信用进行研究。经济学自始至终都是研究生产和消费的相互调节的,当我们讨论其中一种时,另外一种也绝不应被忽视。

经济体制的转变使我们告别了短缺经济时代,由原来的卖方市场进入买方市场,居民消费有了更多的选择余地。与此同时也造成了大量商品积压,存货增多。但是应该认清的一点是,并非所有物品的积压都是因为需求不足,这其中有一部分是居民无力购买的,有一部分则是居民无意购买的,从而形成无效供给。从“经济人”假设出发,为追求利益最大化,他所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必须是消费者能够支付并且愿意支付的;换句话说,他的产品或服务对于他本人而言,是能够提供而且应该提供的,也就是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均衡时的供给量,这就是有效供给。作为与有效需求相对应的概念,有效供给在一般均衡中同样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供给而要“有效”,必须具备三个条件:(1)供给应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供;(2)供给应考虑产业结构,符合社会分配比例;(3)供给应是开发性的,而不是守旧的,也就是符合社会需要的、具有创新性的供给。惟有如此,才能被社会所承认,其中包含的价值才能通过交换而实现。

传统经济体制奉行的是超前工业化的非均衡的经济发展战略,因而选择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当代为适应市场经济体制,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战略,并要求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但这一根本性的转变却很难在短期内完成,因而造成许多经济问题。无效供给的出现是其中的一个方面,具体表现在:(1)多年来重复投资、重复生产导致产品结构严重失衡,产生无效供给。由于缺乏投资经验和创新精神,又好大喜功,各地

的支柱产业和经济增长点基本相同,盲目发展汽车、电子、机械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一哄而上,却缺乏后劲,难以为继。(2)一些商品价格过高,超过一般消费者的支付能力,形成无效供给。由于多种税费的存在,房地产价格一直偏高,全国平均每平方米价格超过 2 000 元,普通居民尤其是工薪阶层虽然急需却无力购买,因而造成大量商品房、写字楼空置,据统计,全国空置商品房面积已超过 7 000 万平方米,这也使得新的经济增长点一直无法形成,从而无法带动其他部门发展。(3)一些产品品质低劣造成无效供给。大量的假冒伪劣商品特别是假烟、假酒、假药充斥市场,因其丧失使用价值或使用价值极低,甚至有害身体健康而被消费者拒绝,从而造成大量资源浪费。由此可见,在许多消费者愿意购买或能够购买的情况下,由于大量无效供给的存在,需求无法得到满足,因而将资金转为储蓄。

四、企业亏损与物价下跌之间的恶性循环导致投资萎缩,需求更加不振

凯恩斯认为,投资取决于利率与资本边际效率的对比关系,即使利率下跌,若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幅度超过利率下降幅度,则利率对投资的作用关系便不成立或大受削弱。

市场竞争导致利润的平均化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后者又导致了利润率的下降。据统计,沪、深股票市场上市公司的平均利润率已由 1994 年的 13% 下降到了 1997 年的 9%。而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独立核算企业主要经济效益指标”来看,自 1993 年以来,中国企业的经济效益每况愈下,明显恶化。在成本上升的情况下,由于经营管理不善等原因,资金使用效率下降,从而企业亏损问题变得日益严重。面对严重亏损,企业往往依靠银行贷款来维持生存,而目前的国有银行由于经营机制转换、风险防范意识加强,对于负债累累的国有企业已出现“惜贷”现象;得到贷款的国有企业在预算约束加强的情况下,由于市场需求的约束和自身盈利的影响,投资欲望开始下降;从非国有企业看,缺乏与之相适应的金融机构抑制了投资需求的增加。由于各产业的进入壁垒提高,新创企业所需资本最低限额不断提升,因此,非国有部门的投资增长率几乎为零。全社会投资需求的萎缩必然导致消费需求从而进一步影响总需求的萎缩。在总供给基本不变的条件下,总需求的减少必将导致物价水平的下降,物价下降必将引起企业亏损状况进一步恶化,而企业亏损状况的恶化又将导致总需求的进一步减少和物价水平的进一步下降。这样,企业亏损——投资萎缩——总需求减少——物价下降的恶性循环便形成了。由于国内市场疲软,获利机会减少,投资无法形成气候,因而储蓄增加。

综上所述,伴随降息及开征利息税而(下转第 57 页)

海国家、俄罗斯和其他前苏联国家的收入不公发展迅速。在保加利亚、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收入不公的增加尤为快速,超过英国和美国 80 年代基尼系数年增加率的 3~4 倍。是什么因素导致收入不公迅速增加?首先,与相对平均主义的旧的国有部门相比较,新的私营部门工资收入差距拉大了;其次,在转轨时期,来自“自我雇佣”(Selfemployment)和财产的收入增加了,这两者都是收入不公的来源;再次,失业的前国有部门职工的收入减少了,这对“架空”中产阶级起到了一定作用。

二、未来的挑战

过去 10 年的历程记录了转轨国家取得的进展,但正如 IMF 副总裁 Shigemitsu Sugisaki 在会议总结致辞中指出的,这一记录也强调转轨国家仍然面临着挑战。尽管这些国家普遍设法降低了通货膨胀,并使产出得到了恢复,但它们的状况仍然相当脆弱。通货膨胀仍可能死灰复燃,产出方面的进展可能被抵消,出口部门的压力可能会增强。有鉴于此,会议指出转轨国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作用,促使企业转入市场经济,加快银行部门的改革,解决急剧增加的收入不公问题,强化宏观经济调控。

第一,必须从根本上转变政府的作用。正如 Vito Tanzi 指出的,为了更好地行使职能,建立市场经济需要一个有效率的和公正的政府,需要实施一系列基本准则。制订这些基本规则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广泛分享社会目标,增加财政收入为公共活动筹集资金,有效地使用这些收入,对私营部门的运作进行必要的矫正和管理,确保履约和保护产权。政府还必须在私人养老金和竞争等领域建立适应于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和规章制度,同时废除那些计划经济时代遗留下来的人治色彩浓厚的规定。这些措施将形成一个有利于市场力量有效行使职能的环境,对于促进私营部门的成长和削弱地下经济是至关重要

要的。这些措施还可以降低风险感,从而有助于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当然对于建立基础体制的困难不应低估。

第二,必须改进私有化的程序。强大的机构网络以及开放度和透明度是在这方面取得成功的关键。为使私有化效率更高,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应通过所有权和管理权的重新配置来帮助企业“消肿”和重组,而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将有助于这些行动;应避免将旧企业的劳动力和社会责任转给新的所有者;应将政府的作用重新引导到加强市场纪律和促使建立有效的破产程序上来,同时确保融资决策由管理良好的、受监管的金融部门做出,以此强化以上措施。通过这些措施对企业建立有效的硬预算约束。

第三,金融部门改革将改善金融中介的程序并提高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这是促进增长的根本之举。在给中央银行以更大的自主权方面取得的进展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的一步;同时,建立对外国金融机构开放的竞争性体制,立法并有效实施有分量的审慎的法规也是非常重要的,许多转轨国家仍有必要着力解决这个问题。

第四,必须扭转收入分配的不公。随着时间的推移,体制的变革和日益增加的竞争应有助于减少经济漏洞和收入不公。但这一进程还有待时日,政府有必要为其人民中承受力最差的阶层设立有效的社会安全保障网。

第五,宏观经济稳定是支持结构改革、恢复经济活动和实现持续增长的基础。实践表明,低通货膨胀率事实上是和经济快速增长相伴而生的;而且,通货膨胀持续保持适度水平的转轨国家以及其他较发达的转轨国家,现在都享有一个通货膨胀率进一步收缩的有利环境。转轨国家目前的通货膨胀临界点与工业国已不相上下;因此,承诺在中期内将通货膨胀降低到工业国家水平是合适的,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更是如此。□

编译者单位:中国工商银行总行

(责任编辑:方芳)

(上接第 22 页)出现的居民储蓄存款增加,是城乡居民在制度变迁过程中为追求生命周期效用最大化而采取的合理安排,是二元经济结构的必然产物。要摆脱通货紧缩的困境,必须切实提高人民群众尤其是农民的收入水平,杜绝各类无效供给,改善企业经营管理。惟有如此,才能从根本上带动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 资本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5
- [2] 马歇尔. 经济学原理[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1
- [3] 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M]. 北京:商务印书馆, 1988.
- [4] 张国华. 收入差距对消费需求有何影响[N]. 经济学消息报, 1999-3-12

- [5] 陈东琪. 对近两年宏观经济政策操作的思考[J]. 经济研究, 1998, (12).
- [6] 周天勇. 总需求萎缩的深层梗阻及其扩张途径[J]. 经济研究, 1999, (1).
- [7] 秦池江. 货币紧缩与经济发展战略[J]. 金融研究, 1998, (12).
- [8] 胡培兆. 论有效供给[J]. 经济学家, 1999 (3).
- [9] 余永定. 打破通货收缩的恶性循环[J]. 经济研究, 1999, (7).
- [10] 马洪. 经济白皮书(1997~1998): 中国经济形势与展望[M].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8 150.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系

(责任编辑:月悦)